

# 公共文化空间提升居民幸福感探析

——以昆明翠湖公园为例

周 芳

云南师范大学 地理学部 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在现代的都市社会中，城市公共空间尤其是公共文化空间的存在必不可少，它通过多种功能、价值的实现对当地居民甚至游客都产生重要的文化意义，对城市形象塑造、凝聚居民文化共识等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以翠湖公园为例，分析在公共文化空间视角下作为文化符号表征的城市公园对于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作用，这对于促进城市文化建设、提高居民文化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公共文化空间；文化符号表征；地方依恋；居民幸福感；翠湖公园

## 引言

公共文化空间是一个复杂且多维度的概念，涉及地理学、社会学、城市规划等多个学科领域，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居民对精神文化需求的持续提升，公共文化空间日益成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热点之一。昆明翠湖公园从诞生发展到现在，除了“城市休憩公园”的身份之外，已经成长为昆明的地标式建筑，是典型的“昆明市公共文化空间”。现有的关于翠湖公园的研究大多是从生态学、自然地理、城市规划等视角来分析翠湖作为“自然公园”的本身属性价值和规划设计特色，一部分的人文视角研究也大多集中在历史文化和城市旅游方面，但是从文化视角揭示现代城市文化创新发展以及公共空间对人性的垂询和塑造、促进城市和谐、提高全社会整体道德素质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和文化意义等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空缺<sup>[1]</sup>。本文在公共文化空间视角下，以昆明翠湖公园为研究对象，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揭示翠湖公园作为城市文化象征性符号提升居民幸福感的机制和起到的重要作用，以期丰富翠湖公园的研究丰度，为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 一、公共文化空间概念解析

公共文化空间，公共空间，亦称为公共领域，由汉娜·阿伦特在分析公民政治生活中最早提出，并经由哈贝马斯的充分论述，成为当前学界研究中的热点话题和分析观点，它是指在城市或社区中供公众集会、交流、参与和体验文化活动的开放空间，例如公共广场、公园、图书馆、博物馆、艺术中心、剧院、音乐厅、街头艺术区域等各种形式的场所。公共文化空间作为社会的核心

载体，在塑造和凝聚社会认同、促进文化交流和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共文化空间具有以下特点：公共性：公共文化空间是面向全体公众开放的，不存在进入的条件和阻隔，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进出和使用，无论身份、性别、种族、经济状况等；文化性：公共文化空间是承载、展现和传播文化的场所，它可以作为提供展示和呈现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艺术表演、展览、文化教育等的场域，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增强生活的文化属性；社区性：公共文化空间是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社区的历史、社会、文化紧密相关，公共文化空间可以成为社区居民社交、交流和共享的场所，促进社区凝聚力和社会互动；多功能性：公共文化空间可以承载多种功能和活动，如休闲集会、运动健身、风景游览等，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可以适应不同群体和需求的变化；可持续性：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和运营应具有可持续性，包括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可持续性，它需要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满足公众需求，实现长期发展和社会效益的平衡。公共文化空间的历史演进反映了社会、文化和技术的变迁。从古代城市广场到现代多功能文化中心，公共文化空间不断适应和满足人们的需求，成为人们交流、参与和文化创造的重要场所。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文化空间的定义和功能不断演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文化需求。

## 二、翠湖公园概况

翠湖坐落于昆明市五华山西麓，因其八面水色清碧、四季竹影葱茏、春夏柳枝垂翠，而得名“翠湖”。它的历史可追溯至元朝以前，当时滇池水位较高，后经元代数次水利工程，水位逐渐下降，翠湖遂与滇池分离，成

为城外一处独立湖湾。湖水退去后裸露的地面被开垦为良田、菜园与莲池，因此得名“菜海子”。又因湖东北有九股泉水汇集成池，亦被称为“九龙池”。直至民国初年，翠湖被正式开辟为园林，遍植柳树与茶花，“翠湖”这一美称才逐渐为人所熟知。如今的翠湖公园总面积约21公顷，其中水域占15公顷。园内两道柳堤呈“十”字交错，将湖面划分为四部分：南北向的“阮堤”，为清道光年间云贵总督阮元仿照西湖苏堤所建；东西向的“唐堤”，则修筑于民国时期。

从人地关系视角来看，翠湖的生态美学价值与生物多样性特征十分突出，尤以每年特定时段出现的红嘴鸥迁徙现象最为典型。这一迁徙行为具有明显的年度周期性与稳定性，至今从未中断，不仅成为翠湖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其景观功能注入了季节性生命活动的独特韵律。翠湖亦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清康熙年间，云贵总督范承勋与巡抚王继文在湖中修建碧漪亭（俗称海心亭），亭周水光潋潋、绿树环合。唐继尧主政时期，修筑东西与南北两道长堤，将湖面一分为四，湖中有海心亭，西有观鱼堂，东南设水月轩。昔日翠湖堤畔曾有“十亩荷花鱼世界，半城杨柳抚楼台”之联，生动勾勒出其如画景致，翠湖也因此被誉为“城中碧玉”。它不仅调节着昆明的气候，更塑造着这座城市独特的气质与风貌。

### 三、公共文化空间提升居民幸福感的机制研究

#### 1. 满足居民审美需求

##### (1) 雅致的环境提供生活情趣

翠湖被称为“昆明的眼睛”，那一汪碧水盛满了昆明人的秋波。自明代翠湖被划入城内范围后，就成为城中胜景，无数达官显要、文人雅士被翠湖及周边地区优越的环境所吸引，在此地建造别业、衙署、园林、寓所、馆舍、学校等等，逐渐形成了以翠湖为中心的生活范围圈，并进一步增强了翠湖的文化特质。翠湖公园的建筑风格是典型的传统中式古典园林式布局，由蜿蜒步道相连的水中小汀、汀上禅院楼阁、院内戏台假山，围墙漏窗、花木扶疏，让游客不时隔窗看到院外亭台湖面，同时有步移景异之感，营造出空间的渗透与层次<sup>[2]</sup>。

昆明素有“春城”之称，其气候以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为主要特征，四季差异不明显，整体呈现温暖宜人的特点。作为昆明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翠湖在不同季节展现出各自鲜明的景观风貌。春季，湖畔樱花进入盛花期，粉白色花簇与湖面碧波形成和谐的色彩构图；夏季，湖面常呈现波光粼粼的视觉效果，荷花成片开放，

散发出清雅香气；秋季，湖水与周边植被色彩相互映衬，形成丰富的色彩层次；冬季，昆明天空多数时间保持晴朗，大量红嘴鸥在此栖息，成为该季节的标志性景观，偶遇降雪时，雪景与湖光交融，呈现出类似江南地区的景观意象。翠湖已经成为周边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所有关于昆明的景观构筑，都逃不开关于翠湖的描述。

##### (2) 昆明市历史和文化的缩影

一部翠湖史就是半部昆明史。翠湖池水见证了昆明城市的发展历程。在历史上，翠湖承载了昆明的水运功能，同时也是文化和官府机构的聚集地。明初戎马倥偬大半生的西平侯沐英，曾在翠湖建“柳营别墅”颐养天年；明末，大西军抚南王刘文秀对“柳营别墅”略加修葺，便成了他的“南府”；那一怒为红颜的平西王吴三桂，也在这里留下了他与陈圆圆的凄美爱情故事。近现代以来，翠湖更是成为了昆明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以保存文脉，几经周折最终选定昆明作为办学地址，在昆建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化巷、钱局街以及文林街、龙翔街、凤翥街一带成为联大师生和国内一流文人学者活动最频繁的地方，翠湖文化圈开始逐渐成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建了省图书馆、省农展馆（后改名为省科技馆）、省文联、翠湖宾馆等一系列文化设施及标志性建筑；西北郊更是新增了一批院校，出现了一二一大街、学府路、文昌巷等街巷，翠湖文化圈的范围至此而极；除了文化氛围，翠湖更是昆明乃至云南革命的见证者，昆明爆发了护国运动、一二一运动等大大小小数场革命运动，翠湖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在翠湖周边留下了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旧居、卢汉公馆、抗战胜利纪念堂等许多著名历史建筑，作为“半部云南史”的见证者，翠湖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云南昆明历史的一部分。

##### 2. 提供休闲和娱乐场所

昆明温和晴朗的气候孕育了昆明人平和温吞的性格，形成了昆明这座城市独有的“松弛感”。学龄前的孩童，退休的老人，休闲的伴侣，都会的空闲之时寻一处空地晒晒太阳，闲聊家常，要是有更大一点的场地，往往摆上一个音响就成为跳广场舞的绝佳胜地，云南少数民族众多，音乐歌舞往往也带有浓郁的少数民族色彩，在翠湖之中，与传统小调、现代流行摩登一起，在“方寸”之间既“百花争艳”又各自“偏安一隅”，达成了一种奇妙的平衡。现代社会使得我们的经验世界总是面临着断裂和碎片的危险，而在翠湖公园里出现的这些群众性的

自发文化实践活动却让人充分享受到审美的愉悦性和自由心态,体现着身体经验与审美经验、审美情感与日常生活经验的完整和统一。同时这种审美性体验的获得和投入,描绘社会中最成功的人际关系,为社会的审美性重构奠定基础<sup>[1]</sup>。

### 3. 满足居民的社区参与和社交互动

做为公共文化空间,翠湖最大的特点就是公共性,进入翠湖公园的对象是充分开放的,不设限制,最大限度得保证了入园游客的广泛性和公平性。翠湖公共空间的共享性质使得公园内空间、设施等资源得以被更多的人利用,再加之优美的环境,翠湖就成了人们交流互动的不二选择。翠湖公园做了很好的功能分区,根据不同的需求分为不同的区域,健身、漫步、观鸟、喂鱼等,人们在这里互相交流生活琐事、进行经验、心境的分享,从身体到心灵的压力都能得到充分的释放,同时,公民们的共同的参与、共同的活动空间,共同的审美性体验,可以培育出“感知共同需求”,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融合。

### 结论

空间与地方依恋紧密相关。当空间被赋予情感时,则会成为地方,并建立人和地的情感和心理联系。地方依恋集中体现为人地之间的情感联系,是指个体基于情感、认知、行动的纽带形成的对某一特殊意义地方的依恋,包括情感认同与功能依赖<sup>[3]</sup>。翠湖是昆明人共同的情感纽带和记忆载体,是周围的居民甚至游客交流、互动的场所,关联很多社会关系网络的产生与变迁,促进了居民之间的情感交流与联系,更承载了昆明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众多的特色民俗活动仍在公园里举办,通过参与公共文化活动,人们更加深入的了解昆明的历史文化,更加贴近昆明这座城市的文化脉搏和情感记忆,更重要的是当居民在共同的文化空间中参与共同的活动、交流时,会形成一种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一步加强人们对地方依恋的情感。当地方依恋产生时,说明居民对所在地方产生了认同感和归属感,地方依恋程度越高,人们就会有越强的安全感,越愿意留在当地。地方依恋体现了个体对空间产生的认知和情感,可以满足个体生活需要和心理需要而提升幸福感。正所谓“吾心安处是吾乡”,人们从认同感、归属感、安全感和自我的价值实现中生发出生活的幸福感<sup>[4]</sup>。居民在这样的环境和空间中能进行更好的人际关系互动,以更加健康的心态工作和生活,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而为主体人群带来更高的生活幸福感。

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作为城市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风貌与人文气质的物质载体与集中体现,也是市民感知生活品质与获得幸福感的重要场所。它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场所,更是具有社会意义与情感价值的公共领域。在现代化与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其特有的物理场域属性与历史文化属性,为居民提供了交往、休憩与认同建构的平台,从而在心理和情感层面满足人们对归属感、尊严感与意义感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它进一步巩固并深化了基于血缘与地缘的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使其在现代城市环境中仍能发挥重要的联结功能。作为具有鲜明文化指向的载体,公共文化空间在精神教育与价值引导方面发挥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政府及文化工作者通过策划组织具有积极导向的文化活动、营造健康向上的精神氛围,使居民在参与过程中不仅获得审美体验,更在潜移默化中形成更高级的文化共鸣与精神认同。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提升社会的整体精神风貌,也在无形中提高了居民对幸福的感知能力与情感阈值。在长期的文化浸润中,个体对家乡、社区乃至国家的情感联结不断强化,文化认同与归属感随之深化,从而为构建高质量的精神家园、维系与化解“乡愁”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路径。这一机制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治理启示:在公共文化空间的规划与建设中,必须兼顾地方独特属性与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整体要求,实现二者在功能与象征层面的有机统一。同时,应充分重视居民在文化实践中的双重角色——他们既是文化的接受者,也是文化的再创作者。只有激发居民的主体性与参与能动性,才能实现文化治理效用的最大化,推动城市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最终达成文化传承、社会整合与精神塑造的多重目标。

### 参考文献

- [1]肖琼, 颜桂英.集体记忆、公共空间、符号表征:论翠湖公园的现代审美功能[J].南方职业教育学刊, 2014, 4(01): 67-72.
- [2]胡文龙, 李志英, 王亚南.昆明城市公共空间的地域文化表达分析[J].安徽建筑, 2023, 30(02): 6-7+77.
- [3]朱竑, 刘博.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等概念的辨析及研究启示[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01): 1-8.
- [4]蔡晓梅, 何洁.基层治理视角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学术研究, 2023(11): 63-69.